

王誠

三平史考

乾符入爲工部尚書出校戶部尚書中節留劍南東川道節度使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井序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爲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元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幼悟法印不汨灼機日捐薰結元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懸秦西室百丈石碧後依大顥大師寶歷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芟蘿住持做爲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秘密度門虛往實歸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智氣所拘推爲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爲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

● 颜亚玉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三平史考

颜亚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三平史考
颜亚玉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明日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8.2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7500 册

ISBN 7—5615—0581—7/K·114

定价：10.00 元

序

佛教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故近来对佛教史的研究渐趋发达，然多为佛教通史或断代史的著作，或为专题的或对某一特定制度的论述，至于对某一寺庙及其创始人的历史著述，则不多见。而对个别寺庙及其开山祖的研究，可以充实佛教通史、断代史及专题的内容，聚拳石而成高山，积细流而为大海，个别寺院及其人物的研究，实在是缺少不得的。

现在漳州市辖下平和县的三平寺，是福建省有名的古刹，晚唐时由义中禅师所创建，迄今千余载，不仅香火不绝，抑且香港、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来此礼佛、寻宗问祖者络绎不绝。厦门大学历史系颜亚玉女史，目睹这一情况，有志于探求该寺的历史渊源和沿革，以明其现状，就潜心搜集资料，从事研究，历时两年多，撰成《三平史考》一书。书分三编：首编论考义中禅师生平事迹，兼及禅宗在福建的传播；次编考订三平寺的历史及其文物；第三编则旁述与三平寺有关的历史人物。作者遍阅内外典籍，旁搜远绍，详加考证，用力勤而所得多，其详具见于书中，此不复赘，读者可细细体味之。

我读此书，颇有所感：一则书中说到“毛侍者”、“蛇侍者”等，考订为当地原居住的不同民族，义中以武术或法力战胜他们后，变仇人为友人，于是这些少数民族日趋融合，有利于当地的社会发展。这是一椿好事。二则义中禅师“亦禅亦农”，传入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又是一椿好事。三则义中禅师长于医道，治好了当地许多居民的疾病，传播了医术医方，俗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更是功效显著的好事。义中禅师创立和住持三平寺时，做了这许多好事，其后继者虽或良莠不齐，但其流风余泽，沾溉后

人，长为来者所宗仰，是亦三平寺至今香火犹盛的原因之一吧！只要真正替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还要说明，此书非惟对整个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个案，抑且，促使自三平而支分脉散于港、台及海外各地者，寻找源头之心油然而起，这就会加强海峡两岸的联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佛教史的学术研究成果，还具有有利于祖国统一、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故乐而为之序。

韩国磐

壬申年仲秋志。

前　　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传入中国以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了解佛教，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社会近两千年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就很难认识真正的中国历史，这已成为学术界近年来不少人的共识了。今天，佛教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佛教史的探讨也越来越引起史学工作者们的兴趣。

中唐以来，风靡中国古代社会的禅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留下了许多印痕。曾是禅宗活动中心之一的福建，禅宗的影响更是无处不见。一些地方的开发，甚至与禅宗的活动息息相关，如闽南地区的三平，便是一典型代表。

所谓“三平”，是距漳州 50 公里之遥的一处山地。古时岩谷深邃，结曲奇危。旧志云：“登者必历三险三平，方至其地，故名‘三平’。”唐时，义中禅师因芟荆住持，敞为招提。四方学人不远荒服请法者，常有数百人。“师以山而道侔，山以师而名出”，义中禅师因此成了曾经彪炳佛教史册的“三平大师”，三平也成了一度名扬四方的出名道场。三平原居有“身毛楂楂”的原始土著民——“毛人”，因体质特征和生活习性与山外居民有异，被视为“山鬼”，三平山亦被称为“人迹不到”的“鬼窟”。义中驻锡后，革除陋习，教民耕垦，与民治病，三平逐渐开发。至清，已是“教养涵濡、户口殷繁”之乡了。而三平寺，在历史长河的运行中，几经兴衰，至今香火犹盛。祖籍闽南的港澳台胞及海外侨胞，纷至沓来。每年入山进香者，常有数十万人。他们寻根访祖、顶礼膜拜，络绎不绝。

毫无疑问，三平史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从社会史方面看，这是佛教向中国社会渗透并影响其历史发展的一幅写照。它具有深入认识福建乃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史学价值。从佛教史方面看，义中禅师及三平寺史的研究，则有充实佛教史研究的直接意义。大凡一门学问，宏观的论述及微观的考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地方性佛教史的探讨，一个个寺院及其开山祖的深入考察，必定可以丰富佛教史的研究，并将其引向深入，而这种探讨和考察，亟待广泛开展。不仅如此，三平史的研究，还将促进港澳台胞及海外侨胞与大陆本土的联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已勿庸多言了。

自古迄今，有关三平的史料和论述不多。文献史料方面，除王讽撰的《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与灯录中的《三平义中禅师》尚属专篇外，余者就是散存于志书及释家典籍的片断记载。专篇字不过千余，十分简略。片断记载或相抵牾，或相重复。所以清人对三平寺史，已有“代代兴废，不可考稽”之叹。当今的介绍文章，也只好多着墨于传说，至于义中禅师的生平事迹，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有鉴于此，拙稿钩沉索隐，在尽力发掘史料的基础上，辨析真伪，考述了义中禅师生平事迹及三平寺的历史状况。囿于史料无从详究者，则提出问题，以俟方家。对与三平有关的历史人物，考虑到他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在三平的历史上，起过作用，当是三平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人或为一代显宦，或为一方缙绅，在地方上不乏建树，且大多留有遗迹，研究其人其事其迹，对于考察福建文化，亦不乏意义，故另设一编以统摄。书分三平义中、三平寺及有关历史人物三部分，各部分既可独立成编，又互有联系。文章以考证为主，但又不拘于此，年表、笺释、传记或有包容，书名《史考》，取其大宗也。对有关历史人物，务求言出有据，少作或不作评论，留待读者自行判断。他们的生平事迹或有歧说者，则予以指出，并根

据它们与本书主题的关系，酌情略作订正。

由于个人学识水平有限，掌握史料与分析史料的能力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方家及读者，不吝赐教。

颜亚玉

1992年秋于厦门大学新西村

目 录

| | |
|-------------------------|--------------|
| 序 | 韩国磐 |
| 前言 | (1) |
| 第一编 三平义中禅师 | (1) |
| 一、义中所处时代的禅宗 | (1) |
| 二、义中生平事略 | (26) |
| 出生与出家 | (26) |
| 从师与嗣法 | (35) |
| 与韩愈交往 | (50) |
| 漳州事迹 | (70) |
| 三平卓锡 | (78) |
| 三、义中生平及佛教大事年表 | (91) |
| 第二编 三平寺 | (128) |
| 一、寺简史 | (128) |
| 唐代建寺 | (128) |
| 宋元重修 | (132) |
| 明清重兴 | (142) |
| 香火外传 | (159) |
| 近代状况 | (163) |
| 二、住持与僧人 | (165) |
| 三、诗笺释 | (168) |
| 四、名胜古迹 | (173) |

| | |
|--------------------|--------------|
| 五、王讽碑 | (179) |
| 第三编 有关历史人物 | (192) |
| 一、王讽 | (192) |
| 二、郑薰 | (198) |
| 三、蔡如松 | (205) |
| 四、颜师鲁 | (210) |
| 五、颜颐仲 | (216) |
| 六、林釤 | (221) |
| 七、陈天定 | (227) |
| 八、王志道 | (231) |
| 九、李宓 | (235) |
| 十、王材 | (237) |
| 十一、黄梧 | (241) |
| 十二、黄仕简 | (244) |
| 十三、蔡新 | (247) |
| 主要参考文献与引用书目 | (251) |
| 后记 | (254) |

第一编 三平义中禅师

一、义中所处时代的禅宗

三平义中禅师，生于建中二年（781年），圆寂于咸通十三年（872年）（详考见本编《生平事略》），相当于唐德宗至懿宗时期。要想深入了解义中的一生，首先要了解这一期间的禅宗，让我们从唐代佛教的发展开始说起吧。

众所周知，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用的政策。而儒、释、道三家力量的对比，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及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在不同的时期，呈不同的变化。大体上说，中唐以后，佛教是占优势的。

玄宗以后诸帝，除武宗外，基本上都是信奉佛教的。代宗以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受他们影响，代宗“信之过甚，常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佛像经教念诵，谓之内道场。供养甚贵。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寇虏。幸其退，则加其锡。赉不空三藏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又诏天下官吏不得棰拽僧尼。又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于兰盆，饰以金翠，设高祖七庙神座，各书神号识之。迎出内，陈于寺观，引道繁盛，岁以为常”^①。至宪宗时，又有“迎佛骨”一事。据说凤翔法门

^① 《僧史略》卷中。

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一节佛的手指骨，塔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宪宗得知，决定迎佛骨。一时，上下哗动，“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①。为此，刑部侍郎韩愈，曾作《论佛骨表》以谏，但至懿宗时，此举复兴，且盛况较宪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②

统治者既然如此崇佛，理所当然，对僧人也就另眼相看。

首先，为僧与为官一样，可以免役。德宗时，“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③，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其次，寺院可以占有大量土地。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份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④一般寺院，也都有私置田地。如甘肃的大象寺，共有大小庄园六处，土地五十三顷五十六亩。另有生、熟、坡荒地共五十多顷。^⑤在一些地方，寺院的土地田产甚至超出了官府的控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⑥。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④ 《法苑珠林》卷六二《祭祀篇》。

⑤ 《金石萃编》卷一一三。

⑥ 《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

第三，僧人可享有各种封赐，礼遇殊荣。一是封授官秩。如代宗时，加不空三藏至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二是赐紫。古代赐人服章，以朱紫为贵。有加紫绶必得金章令之言。僧人但赐紫。肃宗以后诸帝，多行此赐，连反佛的武宗也不例外。三是赐师号。玄宗、穆宗时赐，或名公，或名师。懿宗时始赐大师之号。更有甚者，赐国师号的。如肃宗时有慧忠国师，僖宗时有悟达国师等。四是官补德号。大德原为僧徒神通或贤彦者之称。代宗时敕京城僧尼临坛大德，各置十人，以为常式，有阙即填，遂有官补大德。宪宗时又有引驾大德，宣宗时有禅大德、上座大德、寺主大德，懿宗时有本道大德等等。^①

这样一来，僧人，尤其是高僧，社会地位便非同一般了。如沙门端甫，德宗时，“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常承顾问，注纳偏厚。”也就是这位端甫，“前后供施数十百万，悉以崇饰殿宇，穷极雕绘”^②。僧人能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的生活，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五灯会元》卷五记载了这样一则史料：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本习儒业，将入长安应举，方宿于逆旅，……偶禅者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者曰：“选官何如选佛？”

在禅者的眼里，选官不如选佛！丹霞一听，遂改初衷，决定出家了。而当时由儒转佛者，又何止丹霞一个！让我们翻一翻《宋高僧传》看看吧：

释神秀——少览经史，博综多闻。既而奋志出尘，剃

^① 《僧史略》卷中、下。

^② 《宋高僧传》卷六《端甫传》。

染受法。^①

释法钦——门地儒雅，……雅好高尚，服勤经史，便从乡举。年二十有八，倣装赴京师，路由丹徒，因遇鹤林素禅师，……悟识本心，素乃躬为剃发。^②

释道树——耽嗜经籍，曾无少懈，……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尘。^③

释宗密——家本豪盛，少通儒书，欲干世以活生灵，负俊才而随计吏。元和二年，偶谒遂州圆禅师，圆未与语，密欣然而慕之，乃从其削染受教。^④

.....

这么多人由儒转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一点便是——出家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了更有吸引力的出路了。

对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出人头地，达到端甫那样的社会地位，过上那样的生活，但为僧至少可以减免徭役，对不堪徭役重负的人们来说，仅这一条也足以使他们趋之若鹜了。中唐以后，统治者实施的政策，又给出家打开了方便之门。

唐制试经度僧。《虚堂和尚录》卷四载：“自唐以来设安置局，试经得度……其间获中僧科者，官给黄牒剃度为僧”，说明了这一状况。安史之乱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肃宗用右仆射裴冕计，实行鬻度。凡想出家为僧者，先纳“香水钱”，随后许受戒出家，发给度牒。后来“诸征镇尤而效焉”^⑤，这一做法虽时有禁止，但通过这一渠道出家者，仍不可胜数！如徐州王智兴奏置戒坛于临淮佛寺，结果“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剃发，……度江者，日数百；苏常齐

① 《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

② 《宋高僧传》卷九《法钦传》。

③ 《宋高僧传》卷九《道树传》。

④ 《宋高僧传》卷六《宗密传》。

⑤ 《僧史略》卷下。

民，十固八九！”以致宰官惊呼：“若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①

崇佛礼僧，出家又不失方便，于是，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是僧数猛增，佛教寺庙大量兴建。据《法苑珠林》卷一百载，高宗时有僧六万人，寺四千所。武宗会昌五年，天下竟有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②

二是佛经大量翻译，教理争相疏讨，各种佛教宗派相继形成。

唐代佛经的翻译，成就是空前的。早在太宗时，玄奘至西域，取回大量佛经，在太宗支持下，组织一代高僧二十多人，就已译出经论等七十三部，共一千三百三十卷。^③ 武则天至睿宗时，义净三藏也译出经律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④ 中宗时，智严又译《生无边法门陀罗尼经》，般刺密帝则译《楞严经》。^⑤ 而后历代，还不断有翻译。如玄宗时金刚智、善无畏译密宗要籍；^⑥ 代宗时不空译密典；^⑦ 德宗时般若三藏等译《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华严经》等，莲华精进译《十力经》、戒法译《十地经》；^⑧ 宪宗时般若等译《本生心地观经》；^⑨ 文宗时满月等译《陀罗尼经》^⑩ 等等。

佛经的翻译既日益增多，教理的疏讨也就日渐繁密。早在陈时，在魏晋以来译经的基础上，就已出现“唯竞穿凿，各肆营造，枝叶徒繁，本源日翳。一师解释，复异一师。更改旧宗，各立新意。同

①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③ 《续高僧传》卷五。

④ 据《开元释教录》总标数。

⑤ 《宋高僧传》卷三《智严传》；卷二《极量传》。

⑥ 《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卷二《善无畏传》。

⑦ 《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

⑧ 《宋高僧传》卷二《智慧传》；卷三《悟空传》。

⑨ 《宋高僧传》卷三《般若传》。

⑩ 《宋高僧传》卷三《满月传》。

学之中，取寤复别。如是展转，添糅倍多”^① 的现象。及至唐代，门户见深，宗派林立。有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禅宗等等。中唐以后，诸派别中，最有影响的便是禅宗。

禅宗的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原是印度各宗教共同的修持方法，并不为禅宗所独有。禅宗自谓教外别传，相传释迦牟尼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释迦牟尼曰：“吾有正眼法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摩诃迦叶。”^② 迦叶乃为印度禅宗初祖。传至二十八代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③ 时来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达摩初在江南，后游嵩洛，由南而北传播其禅法。他的禅法，所依经典为《楞伽经》四卷。认为入道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称“二入”。其中“理入”属于教的理论思考，即“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④。意思是说，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本具佛性，只因客尘所障，不能显了。令舍伪归真，就必须“壁观”，也就是要屏除一切杂念，寂然无为，这样便可“与道冥符”——自身与真如佛性相契合。这里所言之“壁观”，并非对墙壁而观，而主要是要人“安心”，所以“安心”被认为是达摩禅法的一大特色。“行入”属于实践，分作四种。其一，报冤行（逢苦不忧）；其二，随缘行（得乐不喜）；其三，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其四，称法行（法指空无之理，称法而行即无心而行）。由此可见，达摩的修行法是一种逐步深入的修行法，实际上是一种渐修法。它提倡不怕苦，不求乐，可以说主张的是苦行。

达摩后来传法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其

① 傅大士《明道论》，见《全陈文》卷十六。

② 《五灯会元》卷一《释迦牟尼佛》。

③ 一说在南朝宋末。

④ 《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

间，达摩禅学根植于中国大地，渐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慧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玄籍遐览”。^①僧璨等人“口说玄理，不出文记”^②。道信的弟子法融，创牛头禅，以“虚空为道本”，“无心合道”和“无情有性”、“无情成佛”为标帜，把玄学倾向带进了禅宗。而嫡传弟子，第五代弘忍，“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与庄周思想更为接近。^③这说明禅学与玄学已渐相结合，逐步打上中国烙印了。

禅法与禅风，也发生了变化。道信在传统的《楞伽经》的基础上，引入了《文殊说般若经》中的“一行三昧”。所谓“一行三昧”，是“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于佛，专称名字”的念佛胜方便。据此，念佛念到三昧（三摩地、定）的时候，就能达到“即念心是佛”的境界了。后来道信在他的《入道安心要方便》中，又对这一思想作了发挥：“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这便是后来禅宗“即心即佛”，视自性为佛性，不离生身而另求佛这一思想的渊源。受般若学说的启发，道信还把达摩禅的“安心”说，修改为“亦不提心，亦不看心”，并提出“直任运”的修禅方法。不过，道信的禅法，还是属于“依教明禅”的“非离文字”的。弘忍的东山法门，则明确地提出了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禅法。

禅风方面，据《传法宝记》记载，达摩“行无轨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至弘忍，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可见禅者已由随缘而住、独往独来、秘密单传变为择地开居、营宇立像、普遍传法了。这无疑为后来禅宗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团体，并且走向繁荣昌盛，

① 《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

② 《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

③ 参见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